

论复卦的“贵生”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田青青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复卦是《周易》的十二消息卦之一, 约天时为农历十一月冬至日, 阳光直射点开始向北半球回归; 约卦象呈“雷在地中”欲震、阳刚复长之象: “阳复、阳来”, 有一阳来复, 万象更新之意, 故复卦的卦德为阳为生。关于复归何处的问题, 历来是见仁见智, 不一而足。本文拟从“复见天地之心”着眼, 对复卦的“贵生”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试作阐发。

关键词: 复卦; 天地之心; 贵生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3882(2006)03 0068 05

On the thought of “valuing life” conceived in hexagram Fu and its actual significance

TIAN Qing q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Hexagram Fu 复 (Returning, the 24th hexagram in the received version of *Zhouyi*) is one of the twelve waning and waxing hexagrams and approximately corresponds to the Winter Solstice when the sun's straight radiating point begins to return to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t manifests an image of “thunder under the earth” which symbolizes the rebirth of *Yang* and the myriad things. So, the attribute of hexagram Fu is *Yang* and growth. A consensus has never reached on the issue of which place it returns to. By the saying of that “Fu reveals the heart of heaven and earth” cited from the *Tuan* 象 (Judgment) of the hexagra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thought of “valuing life” conceived in the hexagram and its actu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hexagram Fu; the heart of heaven and earth; valuing life

从卦序上看, 复卦经由剥卦而来, 是以阴剥阳发展到极至的必然结果。剥卦下五爻皆阴, 上爻为阳, 阴至极处必然会一阳复生, 岁在农历十月末, 纯坤用事, 坤阴将尽, “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 则阳复来, 剥卦六爻为六日, 则复卦之初九一阳为第七日, 故言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七日来复, 天行也; 利有攸往, 刚长也。”(《复·彖》)复归何处? 复归天地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 “生生之谓易”(《系辞上》), 与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 生存发展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 同样引起了我们先民的高度重视, 他们把这一权利视为立身立世的第一要义。先民们以《易》为方法论导向敬畏生命、护持生命, 具体说来就是复道利生进而合道利生, 因此“贵生”的思想是千百年来国人一脉相承的安生立命之本。在工具理性过分膨胀的现代社会, 面对传统价值的颠覆、人的物化程度的纵深化, 这一思想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生存的意义, 从而在现代社会“如何生存”、“如何生存得更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闭关待复, 修养生息

复卦坤上震下, 有雷在地中之象。“万物出乎震”(《说卦传》), 混沌太初, “寂寞和顺”(《淮南子·本

收稿日期: 2006 03 22

作者简介: 田青青(1970-), 男, 湖北武汉人,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军事经济学院社科部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经训》), 因为有雷震, 才分阴阳二气, 阴阳和合才会化生万物, 有万物才会生男女, 才会化育出一个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世界。虽然新的生命周期即将开始, 但是约四时而言, 却是冬至, 万物于冬至应是守藏之时, 在生命肃杀的至日, 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则应顺天时、地利而闭关内省、蓄精养锐、修养生息以待新一轮的四时大化运行。所以《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 商旅不行, 后不省方。”意思是说统治者在冬至日诏告全国: 关闭出入关口, 让百姓休息, 连一贯四处游走为生的商人旅客都在国内休息, 不能出行远方, 统治者也休息, 不朝见群臣, 也不出行省察四方国土。关注民生, 适时地与民休息是每一个开明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

“先王以至日闭关”, 体现了开明的统治者对天地之道的一种敬顺态度。通过闭关内省, 静默观照力图揣摩天地之心, 推天道以明人事。自从“人猿揖别”, 基于生存发展的本能, 人类就开始了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 开始了人与天“沟通”。在上古时代, 人类将异己之天对象化出来, 试图通过巫术祭祀等手段得到天启神示。这种沟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往往是通过人自身的自我观照来实现的, 人以自己的身体为象征, 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和价值。所谓静而后定, 定而后虑, 虑而后安, 只有外息攀缘, 内安身心, 使身心一如, 才能以人心合于天地心, 尽性然后知天, 从而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规律进行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践, 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约统治者而言, 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 对天更应存敬畏之心, “敬天保民”、“修德以配天”是对君主的基本要求, 也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放眼数千年的治乱兴衰, 不难看到: 每当天下初定, 百废待兴之时, 统治者往往会颁布一些轻徭薄赋, 奖励农耕的政策, 让臣民在历经长期的战乱动荡之苦后, 得到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是典型的例证, 这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说民为国之本, 民富则国强。这种人本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科学主义占意识形态主流的现代社会里, 一方面, 工具理性大显身手, 在短短一个世纪里, 创造了比人类有史以来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 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 物质文明的极度繁荣也加剧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 对天地的敬畏之心丧失殆尽, 违背自然规律, 对自然环境进行毁灭式的开发利用, 导致大气污染、土壤沙化、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 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因此, 可持续发展成了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人类必须重新“闭关”反省天人关系, 尊重自然并顺应自然, 从“天人对立”复归于“天人合一”。同时, 随着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 人的物化(人格的异化)呈加速发展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 伴随着物质文明的日益繁荣, 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意义日益丧失, 人类在物质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 精神家园却日益荒芜, 信仰的虚无化与边缘化让人在终极意义上无所皈依, 行走在茫茫人海中却倍感孤独; 道义的废弛, 诚信的败坏, 是非美丑善恶的混淆让人感受到人性温情的缺失, 进而丧失生存的安全感, 生活在一种人心惟危的恐惧中。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价值追求过分偏重于物质利益最大化而远离了人自身的自我超越性, 远离了形上之天, 因此必须复归天地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各国为此都做出了尝试, 中国人时下流行的“五一”七日游、“十一”七日游便是其典型代表。人们在假日里放下劳作, 重新亲近自然, 回归自然, 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 让心灵得以休养生息, 以此为契机重新唤起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注。精神生活或者说灵魂生活代表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存状态, 关注并解决这一问题则是一种更深刻的人生关怀。一言以蔽之, 顺天地无为之心, 合理地节制物质欲望, 提升灵魂生活的层次, 则是人类走出当前困境的发展之道。

二、复以合道, 守中持正

复卦初九一阳, 余爻皆阴, 约天地四时而言, 有一阳来复, 万物复苏之象; 约有为君子而言, 有“正心”、“诚意”以顺应治世初现之意。作为以天下苍生福祉为己任的有为君子, 要实现修齐治平济世为民的伟大抱负, 就应该勇于改过迁善, 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复以合道, 以德养身, 才能上察天地之心, 下通经纶之道。因此, 初九《象》曰:“不远之复, 以修身也。”对君子提出了修身的道德要求:“独复”、“敦复”。中国有重德的文化传统, 任何有为君子必须遵循先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路线。“先做人, 后

做事”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价值标准。先有德行然后做事或做事有德行，才会给人以安全感和可靠感。

在长期的生存发展实践中，在长期与上天的沟通过程中，人作为实践主体，同时又是天人沟通的能动的环节，人要知天然后按天道行事。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要求人是有道德的人，才能以德配天，才能得于天，即外得于天，内得于心。至于如何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复卦从两方面进行了规制：其一，“中行独复，以从道也”。约卦象上说，六四处于五阴之中，离初九已远，而初九一阳作为复卦主爻，规定着全卦的性质，阳为天为生，六四上下各有二阴，所以其复归于阳只能是“独复”；约人的道德修养而言，远离了他律的束缚，即使在一个人独处时也要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自觉用道德规范反省自己的言行，将外在的“道”内化为道德自律。道德生活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生存体验，人在关注自身生存问题的同时，要把个体的生存问题置于他人、社会的生存问题中进行整体权衡，注意到其中的问题间性，从个体与整体息息相关和发展的角度，对自己利益自觉进行一定程度的让度，在利己和利他问题上进行折衷。其二，“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六五以阴居六爻之尊位，看似失位，但其同时居坤正位（复卦上卦为坤），而坤有化育之德，故六五有居中自正、和合阴阳、厚德载物的意蕴。和合约人道而言则是中道，要求为人处世要叩其两端而用之。就形上意义来说，人性中蕴涵着善恶美丑等矛盾的因子，如人总是在动物性和神性之间摇摆，人如果过分偏向于其中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人格的分裂而不再成其为人。要化解这一矛盾，“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方法，居中则自正，“中”意味着即此即彼、非此非彼。即此即彼意味着人同时具有动物性和神性的双重特性。非此非彼意味着人同时又有别于动物和神；有别于动物和神就意味着人之为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约现实生活而言，“中”还意味着可此可彼，其中蕴涵着无限的可能性，在众多的可能性中，人是自由的，因为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人可以根据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以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发展为目的，将众多的可能性中有利于自身的部分转化为现实性。“中”同时也规定了现实生活中人们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度，以“中”为基准，人的行为所达到的限度总是游离在“中”左右。这样才能不过亦无不及，凡事留有余地，处世才能游刃有余。

由此可见，人道是取法于天地之道而与之相应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化育之功，人有利他之性。尽管“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但是在大自然面前人总是渺小的，因此人道必须主动复归于天道，合于天道才会有生存发展之道。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必须取法于天地之德而成人之德，从生存论意义上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为生存而进行的选择总是以天地之道为前提的，这是人类有始以来无法回避，也无法易移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复以合道，实际上是以人道合于天地之道，以天地之德来熏习涵养人的道德情操。

三、休复下仁，和谐共生

复卦六二阴爻居阴位而得位，又比于初九而附顺之。初九一阳为生命的发动者，六二则是“男女构精”（《系辞下》）的直接承受者，约生命演化而言，万物从此肇造。故其《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休止既往之非而复归一阳之正，有处中位、亲仁善邻的意味。个体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之外，人类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自然之外，因此只有尊重并关注一切生命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人类自身才有可能生存发展。

生产生活实践使人类一步步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特殊的种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主体意识也日益觉醒，这一方面提高了人的生存能力，丰富了人的生存内涵，使人从单纯追求物质生活发展为追求物质和精神双重生活；另一方面，自从有了人，整个世界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分化，这种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日益远离了自然，同时也远离了自身；继自然界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工具之后，他人也成为了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自然沦为人的奴仆的同时，人也沦为自己的奴仆；天人对立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对立起来。上个世纪是实践理性最成功的一个世纪，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是以破坏天人关系为代价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圈变得越来越脆弱，天人关系的恶化让人类遭到了天谴，进一步生存发展举步维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

造成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丧失,形成人人自危的尴尬局面。这难道是因为“天地不仁”、“圣人无仁”(《老子》第五章)?其实天地化育万物是遍及一切的,圣人的博爱精神也是遍及一切的,造成今天的恶果实际上是人类咎由自取。因此“休复”“下仁”具有双重的现实意义:其一,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休止以往以自然界为“刍狗”的粗暴做法,复归到敬天顺天的原则上来,把人文关怀的精神扩展为对自然界的护持之情,让人性的超越精神在环境伦理中得到高扬。其二,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休止以他人作为“刍狗”的功利主义,复归到恕道的原则上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尊重他人的生存发展权利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存发展权利。在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以经济为纽带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民族、国家的能源信息和技术智力支持。所以,现今的人们经过反思,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和平、发展、合作的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以合作求生存,以互助求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

“休复”、“下仁”、亲仁善邻的思想也体现了生命伦理关于互生、共生的观念。天生万物,海纳百川,不同生命的多样性存在正是这个世界的生机所在。尽管每一种生命的生存发展模式各异,但是不同的生命体之间总是相依相存的,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寄生现象就是有力的证明,没有各种微生物的生命活动,人类就不可能从自然界获得物质和能量以维持自己的生命;约人类社会而言,社会分工越细,人们需要的满足就越充分,生活质量就越高,生存状态就越好。因此“休复”、“下仁”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尊重个体之特质的人文精神,只有个体“不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体才能最大限度进行创造性劳动,对社会的贡献也才会最大化,那么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生存状态才会更加优化。反之,社会如果用同一种模式去规范个人,不但会约束个性的发展,而且容易使整个社会生活走向单一化和程式化,僵化的社会模式只能使整个社会丧失生机,其结果是人类的生存状态整体退化。

四、迷复行师,反天之道

复卦上六远离初九之阳,位高而无应,故“迷复凶,有灾眚”;初九为复卦主爻,决定了该卦的基本卦德为生,而上六失道已远,离心离德,凶兆毕现,所以“用行师,终有大败”。上六以失道的杀生必败,凶及于国君作为警示,告诫统治者在治世将现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慎重,不妄兴不义之师以劳民伤财,失义的杀戮逆天而行,必失民心,必违天道,必将动摇国家根本。生与杀是对立的一体两面,止杀的目的在于护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价值取向,所谓止戈为武,即使是发动战争,其动机也不在于掠夺而在于以杀止杀,以战争来结束战争,服务于和平的目的,和则天下治,战则天下乱。

自然界的杀戮遵守的是丛林规则,但猛虎捕杀猎物只是为了生计,在解决了饥饿问题后就不存在滥杀,并且它们不伤害同类。反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战争杀戮从来就没有止息过。人类以动植物为食从而维系生命,但并不像猛虎一样仅满足于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在对自然物种进行毫不节制的杀戮的同时,更以战争的形式对同类进行疯狂掠夺。“师之所在,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老子》第三十章),战争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发展遭受毁灭性破坏,人类生存状态急剧恶化。上个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参战国家之多,投入兵力之众,耗费财富之巨,战争规模之大,破坏力之强史无前例,直接结果是参战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倒退数十年之久,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首次投入实战,日本广岛、长崎在两声巨响中,城市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核武器向人们展示了对生命无以复加的整体摧毁能力。战后随着核垄断的打破,当今各国拥有的核武器足以让整个地球毁灭十几次,作为人类屠戮同类的战争形态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现代战争的结果必将走向战争发动者的对立面。不难看到,在未来的战争中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如果不顾这个客观现实盲目发动战争,最后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更有甚者,还有可能造成整个人类的毁灭,地球上的生命也将从此荡然无存。迷复行师,必将违反天地生生化育之道,承受战争恶果的只能是人类自身。

正是在对人类战争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主题,正逐渐为世界上大多

数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和奉行。由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在战后日益发展壮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起已经形成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生力军。只有让反战警钟长鸣，以史为鉴，才有可能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和平，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生存状态的现代化，才会“活得更好”。只有休止迷复之师，复归天地“贵生”之道，尊重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保持求同存异的宽容态度和爱人如爱己的博爱精神，才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丰富各自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

五、结语

“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是《周易》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方法，“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上》）先民们生于天地之间，很自然地形成了直观直觉的思维方式，他们把宇宙与人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加以体察，伦常日用、凶吉祸福是他们“仰观”、“俯察”的最终目的。复卦中所体现出来的“贵生”思想是先民们长期社会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存智慧。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老子》第十六章）换言之，天道地道，其实都是人道；复归天地之心，方为人间正道。关注生命、审视生命正是我们存在的根本理由，只有站在体察天地之心的高度去反思人类的生存现状，才能拥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博大情怀，从而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无意义的符号，“我”的生命、万物的生命从价值论意义上说是休戚与共的，因此只有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关爱生命，把“我”的生命融入到万物的生命中去，才能构建一个和谐而富于生机的现代社会。

责任编辑：李尚信

（上接第41页）

其次，朱震将其卦变说建立在阴阳气论的基础上，以阴阳二气运转不息作为阐发卦变的理论依据，据此，他将卦变说与西汉以来的卦气思想结合，其目的不仅是“借助卦气这种外在的形式完整地表达其卦变的思想”（第259页）^[1]，更是为其卦变说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由于他将这两种学说联系起来，客观上又起到了整合两汉易学的作用。

最后，朱震对于卦变的多种解读，克服了各种体例间单向度、平面化的关系，形成了以爻象变易为主体内容，以卦变为统率，各体例间立体的、多维度的互动和联系。

参考文献：

- [1] 朱震. 汉上易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2] 李鼎祚. 周易集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3] 张惠言. 周易郑氏易[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李光地. 周易折中[M]. 李一忻点校.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2.
- [5] 胡煦. 周易函书别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惠栋. 易汉学[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林忠军. 象数易学发展史: 第一卷[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4.
- [8] 余敦康.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
- [9] 张惠言. 周易荀氏九家易[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丁易东. 周易象义[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林忠军. 象数易学发展史: 第二卷[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责任编辑：李尚信